

清人黄丕烈的藏书人生

□ 石志刚

叶昌炽在《藏书纪事诗》中评价黄丕烈：“乾嘉以来藏书家，当以先生（黄丕烈）为一大宗。”黄丕烈作为有清一代著名的藏书家，其藏书的情怀、识见，其所交藏书之友的行为，都深深地影响着后世藏书人。其对书的情感，投射出读书人的志趣和追求。

藏书家的情怀

黄丕烈出生于具有藏书之乡美称的苏州。黄丕烈家学渊源深厚，自幼塑造了他读书好学的品性。黄丕烈的表兄石韞玉说他：“少岁读书，务为精纯，发为文章，必以六经为根底。”这为黄丕烈走上藏书之路奠定了学识基础。黄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之家，但比较殷实，这为黄丕烈走上购书藏书之路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
等到黄丕烈试图走科举之路但是遭遇挫折，促使他将人生志趣投向藏书。他从20多岁开始一直到63岁去世为止，历时40余年的藏书生活，收藏了大约200多部宋版书和上千种元、明刻本以及其他古籍善本，所收之书之多之精，罕有后人能够与其匹敌。当代学者屠友祥评价黄丕烈“自二十八岁开始收书，系以跋语，至六十三岁谢世，几乎无一日不专意于书。”这段话可为至允之言。

黄丕烈藏书爱书的意识渗透到血液中。作为一名藏书家，他将自己的室名，根据不同的藏书风格和特点，进行命名。表现黄丕烈藏书特点的室名有学山海居、读未见书斋、求古居、陶复斋等；表现黄丕烈藏书志趣的室名有学耕堂、养恬书屋、听松斋、学圃堂等；表现黄丕烈对前人仰慕之意的室名有太白楼、小千顷堂等。

将书作为祭祀对象，是从黄丕烈开始做起的。1801年除夕，黄丕烈在书斋举行了第一次祭书典礼：“布列家藏宋本经史子集，以花果名酒酬之。”后来，每年除夕这一天，他都要举行祭书典礼。在举行祭书典礼的时候，他时常邀请书友一起来祭祀，这种祭祀也成为藏友之间展示藏品、切磋文化的桥梁。

1806年，黄丕烈看到宋抄本《周易集解》，书商标价10两白银。当时有一个叫陈鳙的人抢先定下该书。但是，黄丕烈业已将该书第一册拿走后，虽卧病在床，仍念念不忘此书。陈鳙为了不加重黄丕烈的病情，放弃购买该书。黄丕烈听



大藏书家黄丕烈

后，花钱从书商手中将此书买下。黄丕烈的病逐渐也恢复好了。这段以书治病的史实成为他爱书的佳话。

从他文章中可以看到，他为了收藏古书，不惜持续花费钱财来购买。从“以制钱二千购得元刻本《读四书从说》残本五卷”，“以番钱二十枚购得元刻本《宋朝南渡十将》不分卷”，“宋刻本《陶靖节先生诗注》四卷，百金得之”等等记载中可见其花费颇多。当他以每叶白金二钱购得宋刻本《三谢诗》时，不禁发出“宋刻之贵，至以叶数论价，亦贵之甚矣”的声音，但也有“存此宋刻，差足自豪”的满足感。

63岁的黄丕烈开始走向生命的终点，但就在这一年，他仍积极广收古书，比如宋刻50卷《类编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》被他购买，他还通过“此可为吾家世守之宝”之言来表达当时喜悦的心情。在他去世前的11天，还在为他所收藏的一本书作跋，对书的感情溢于言表。

藏书家的识见

黄丕烈的藏书主要是以质取胜，而不是以量取胜。他为藏书质量定下的标准是“求古”。关于求古，他说：“蓄书必取旧刻名抄。”黄丕烈藏书依据之一是钱曾的《读书敏求记》中定下的书单。他自己说：“余蓄杂家书多旧本，大半出诸《读书敏求记》所载者。”黄丕烈在学余堂书肆上看到旧抄本《孟子注疏解经》，翻阅中见该书有内容残缺之处，心生厌倦，便退还给书肆。等到他翻阅钱曾《读书敏求

记》时，发现该书收录了《孟子注疏解经》，并且写有提要：“《孟子注疏》是从书堂本，简端五行，为鲍翁手笔。”意识到这本书重要的黄丕烈急忙赶赴书肆中求找，发现该书被人携带走了。此时，黄丕烈非常懊悔。过了一段时间，《孟子注疏解经》这本书又意外回到书肆。喜得这一消息的黄丕烈将该书购回。他翻阅此书时，看到的确有鲍翁的手笔，庆幸买到了这本古书。

从藏书范围来讲，古书中经史子集，他都有所涉猎。黄丕烈说：“读书在广见闻，余谓藏书之道亦然。”比如“集”，黄丕烈偏爱唐人文集，藏之甚多，“余最爱唐人文集，非旧刻即名校名钞，故所储甚夥”。从藏书偏好来讲，他喜欢“兼蓄重本”，旨在能够通过相互比照，进行核实。黄丕烈说：“余于古书，每见必收，故一书竟有重复至三四本者。”从藏书意识来讲，他讲究残全俱收。当黄丕烈看到宋刻本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》12卷，保存完整，非常喜爱，不惜花费120两白金来购买。然而，古书由于年代久远，难免有散佚。黄丕烈能够独辟蹊径，致力于对残本的收藏，因为这里面有着他缺与全的辩证思想，收藏暂时的残本，目的是更好地收藏，即收其不全，目的是为了日后收其全。

藏书家的交友

黄丕烈说：“爱书者尤不可不爱友也。”爱书之人必爱交友，所交之友必是藏书有得之人。黄丕烈围绕藏书活动所交之友都跟书有关。他所交之友来自藏书界、学术界等，他所交之友又为他的藏书眼光和活动增加了厚度。

杭州名画家陈鸿寿为当时苏州四个最有名的藏书家周锡瓚、顾之逵、袁廷椿和黄丕烈四人，作了一幅题为《藏书四友图》的画，“藏书四友”之名遂盛称于世。周锡瓚比黄丕烈大21岁，二人因书结成忘年交。在黄丕烈50岁的时候，周锡瓚将自己珍藏的宋刻本《姚少监文集》赠予他。这也是黄丕烈有“知余有同嗜，故踪迹甚密”之语的来源。顾之逵与黄丕烈同时走上藏书之途，二人常因收书而赏奇析疑，尽友人之忧。袁廷椿家有余财，又有祖先遗书万卷。袁廷椿与黄丕烈因书结缘，继而成为儿女亲家。当袁廷椿去世时，黄丕烈还有“手触

遗编涕泗流”的悼念语。

家乡的钮树玉、吴翌凤、张绍仁、汪士钟、石韞玉等藏书家皆与黄丕烈为好友。通音律、工篆刻，嗜好藏书的钮树玉在所游学之处，遇到旧书善本，一定会想尽办法收藏。

黄丕烈与江苏藏书家张燮、瞿中溶、张金吾、孙星衍等也有交往。张燮喜好藏书，聚书万卷。张燮与黄丕烈同去北京参加会试，闲暇之余，遍游书肆，有“两书淫”之称。后来，张燮高中进士，黄丕烈落第归乡，二人遂踪迹渐疏，但仍有书信往来，内容多为藏书事宜。瞿中溶访碑稽古，收藏颇丰，与黄丕烈私交甚笃。二人经常交流藏书心得，黄丕烈称赞瞿中溶“见古书必为讨厥源流”。被黄丕烈称为“爱书好古”的张金吾立志要收藏好书，其所藏之书，经过精心编排，体例精当，被世人所称道。孙星衍喜好藏书，所藏之书不下10万卷。黄丕烈经常向孙星衍借书，且把孙星衍“能再借我影抄”作为人生幸事。

黄丕烈与浙江藏书家黄锡蕃、吴騄、陈鳙、鲍廷博等均有交往。黄锡蕃家富余财，藏书颇丰。黄丕烈说：“椒升（黄锡蕃字椒升），余二十年前友也。颇藏书，最喜金石，好蓄古印，兼精篆刻。尝往来吴门，从潜研老人游。每至，必携古书相质证，余时或得之。”吴騄每遇善本秘籍，一定会倾囊而买，所购之书，筑拜楼藏之。吴騄经常来苏州看望黄丕烈，每来总会和黄丕烈交换各自所需之书，交流藏书体会。陈鳙精通百家经史，性格喜藏，与黄丕烈为书友。陈鳙知黄丕烈购买到一本宋代《梅花喜神谱》，便为其代购一本《梅花百咏》，以配其书。随后，陈鳙又赠送黄丕烈明刻本《名花百咏》。黄丕烈视为珍宝。黄丕烈经常去陈鳙在苏州住所，知陈鳙有一本大德本《汉书》，便以家藏大德本《后汉书》相赠，受到陈鳙喜爱。鲍廷博藏书极多，曾经为朝廷进献自己所藏之书，得到乾隆褒奖。鲍廷博与黄丕烈二人曾“纵谈书林旧闻，娓娓不倦”，被传为美谈。



行，打得行云流水，酣畅淋漓，取得了歼敌1500余人的成果，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。神头岭上“镇神头”，神头岭成为了日军的“伤心岭”。

抗日战争艰苦卓绝，胜败不在一城一池，中国军民凭借顽强的斗争精神，打出了气壮山河的持久战。神头岭战斗仅仅一个月后，386旅772团团长叶成焕牺牲，年仅24岁，在最后一次战斗中，他掩护大家撤退，被日军的弹流击中头部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队伍，队伍呢？”两年半后，386旅作为主力，血战关家垴。772团1营是“尖刀”，咬住日军，殊死较量，在被兄弟部队换下来的时候，只剩下6人，这是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战斗之一。多少人没有看到最后的胜利，但迎接黎明是他们心中最坚定的信念，碧血丹心映山河，不惜此身奉家国。

“千山万壑，铜壁铁墙！抗日的烽火，燃烧在太行山上……敌人从哪里进攻，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！”烽火远去，精神长存，任何时候，彻底的胜利都来自于坚决的斗争。纪念不朽英雄，振兴巍巍华夏。



萧瑀（575—648），字时文，南朝西梁明帝萧詧第七子，隋炀帝萧皇后胞弟，隋朝大臣，唐高祖、太宗朝宰相。萧瑀在唐太宗朝先后六次拜相、又六遭罢相，甚至被罢免全部封爵、封邑，逐出京都。尽管如此，他依然矢志不移，不改忠贞报国的初心，刚直不阿、嫉恶如仇、骨鲠亮直的铁石品格毫不褪色。

西梁皇子入隋归唐两连跳

萧瑀9岁之时，被封为新安郡王。难能可贵的是生于帝王之家、长于富贵窝中的萧瑀，丝毫没有沾染浮靡放荡之气，自幼“爱经术，善属文。性鯁急，鄙远浮华”。

隋文帝开皇七年（587年），12岁的萧瑀随哥哥萧琮入隋，定居长安。隋炀帝杨广仅比萧瑀年长6岁，两人志趣相投，在一起生活多年。杨广为太子时，萧瑀被任命为右千牛（皇帝身边的高级禁卫武官）。

萧瑀的妻子独孤氏，是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的娘家侄女，而李渊的母亲是独孤皇后的姐姐。这样论起来，唐高祖李渊和隋炀帝杨广是姨表兄弟，两人同萧瑀之妻独孤氏都是姑舅表兄妹，李渊比杨广大3岁，在隋文帝杨坚当朝为帝之时，李渊、杨广和萧瑀，是三个交情笃厚的好兄弟。

仁寿四年（604年）七月，杨广继位为帝，是为隋炀帝。姐夫做了皇帝，姐姐当了皇后，萧瑀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，先后被擢升为尚衣奉御、检校左卫卫鹰扬郎将、银青光禄大夫、内史（中书）侍郎。

杨广登上帝位之后，骄奢淫逸，昏庸无道，萧瑀屡屡抗颜直谏，数度搞得杨广当众下不了台，使得杨广大为憋气窝火。大业十一年（615年）八月，隋炀帝杨广巡行北部边塞，被突厥大军层层围困于雁门关，形势十分危急。萧瑀劝谏杨广“下诏赦高丽，专讨突厥，则人自奋矣”。杨广身陷重围之中，当务之急是如何冲出重围逃命，当众允诺同意萧瑀的奏请。可是，当突厥大军解围而去，杨广又懊悔采纳萧瑀的建议，不由气愤难平，当即传旨，罢免萧瑀的内史侍郎之职，贬为河池郡守，并命他不得有片刻滞留，立即前往赴任。

所谓“祸兮福所倚”。隋炀帝杨广冲天一怒，负气将萧瑀贬出京都，使萧瑀侥幸躲过一劫，避免了日后陪同杨广殉葬的悲惨厄运。

隋末，天下大乱。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，唐国公李渊起兵于晋阳，率三万士卒庄严誓师，以“废昏立明，拥立代王，匡复隋室”的名义，挥师直趋关中，攻占长安。第二年，李世民率军进攻割据一方自称西秦霸王的薛举，特地前往河池拜会萧瑀夫妇，萧瑀和妻子独孤氏热情设宴款待。

席间，酒酣耳热之际，李世民忽然神色诡秘，双手捧出父亲的亲笔书信，恭恭敬敬地呈给萧瑀。萧瑀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，李渊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：“瑀弟胸怀万机，才智过人，请速来京师，共辅社稷。”读罢，萧瑀的视线依旧久久凝滞在水信上，神情肃然地说：“社稷危之，明主有出。表哥相召，岂敢违命！”萧瑀立即饱蘸浓墨，修书一封，向李渊表明心迹，派人飞马送往长安。随后，收拾行囊，立即启程，奔赴长安。

李渊见萧瑀夫妇来归，欣喜异常，安排设盛宴款待，任命萧瑀为光禄大夫，封宋国公，拜为民（户）部尚书。

力谏高祖立李世民为太子

唐高祖李渊对萧瑀极为器重，据《旧唐书·萧瑀列传》：“时军国草创，方隅未宁，高祖乃委以心腹，凡诸政务，莫不关掌。高祖每临听政，必赐升御榻，瑀既独孤氏之婿，与语呼之为萧郎。国典朝仪，亦责成于瑀，瑀孜孜自勉，绳违举过，人皆惮之。”

唐朝初创，百业待兴，萧瑀熟识国典朝仪，又忠心耿耿，殚精竭虑，孜孜自勉，素有直声之誉，深得李渊信任。在临朝听政这样隆重严肃的场合，李渊既不称呼萧瑀的职务，也不称呼其姓名，而是信口直呼“萧郎”，而且每次临朝，必赐坐御榻，朝中大小所有政务，悉数交给他掌管，这样的信赖与恩宠实属罕见。

武德五年（622年），萧瑀迁任内史（中书）令，不久又被任为尚书右仆射，位列宰相。

李渊生有22子19女，围绕皇位继承权问题，诸皇子间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，特别是随着李渊渐入老年，这种斗争更加日趋白热化。李渊早在称帝之初的武德元年，就立李建成为太子，次子李世民由于在长期征战中建立起卓著功勋，帐前名将高士云集，羽翼丰满，呼声日高，对于立李建成为太子颇为不服，于是想尽千方百计取而代之。

究竟选谁继嗣践祚？朝中大臣阵线分

忠心不改的直臣萧瑀

□ 刘立祥

明，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大阵营。李渊内心偏向于长子李建成，对次子李世民则心存疑忌。萧瑀是李世民坚定的“铁杆粉丝”。他不顾个人安危，屡屡向高祖李渊净谏，劝李渊早下决心，改立李世民为太子。

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初四（626年7月2日），秦王李世民在都城长安发动玄武门之变，杀死胞兄皇太子李建成和胞弟齐王李元吉，逼迫父亲李渊立自己为皇太子。两个月后，高祖李渊禅位于李世民，是为唐太宗，李渊退位为太上皇。

骨鲠亮直，六遭罢相守忠心

唐太宗李世民继位之初，即任命萧瑀为尚书左仆射，此后20年间，他作为宰相活跃在朝廷权力中心，可谓风光无限。

萧瑀究竟有多牛？据唐人李亢撰《独异志》记载：某日，李世民设宴招待几位重臣，他端起酒杯，扫一眼满座臣僚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你们几位都是朕的腹心重臣，谁觉得自己最为贵幸，便先把酒杯端起来。”在座的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都相顾无语，静默不动，只有萧瑀翩然起身，趾高气扬，旁若无人般举杯相迎，口中还念念有词：“臣乃梁朝天子儿、隋朝皇后弟、尚书左仆射、天子亲家翁。”

太宗闻之，抚掌大笑，举座欢颜。然而，“高处不胜寒”。虽贵为百官之长的宰相，萧瑀的仕宦之路并不平坦。到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，萧瑀先后6次拜相，6次罢相，皆因其坚守大义，直言大讳，大起大落，屡屡罢拜，又屡拜屡屡。

萧瑀就是萧瑀，不管被罢免多少回，也不管遭到什么样的惩罚、赋闲多久，一旦重新被起用，依然是一身浩然正气，无所畏惧，就像战士重又冲上了战场，持盾仗戟，奋勇拼杀。20年间，变化的是宦海沉浮，人情冷暖，不变的是萧瑀公正无私、忠贞亮直、刚直不阿的铁石品格，是任凭风吹浪打永远坚定不移的报国初心。

立身清俭，临终遗书嘱薄葬

贞观二十年（646年），萧瑀最后一次被罢相，且被剥夺了全部封爵、封邑，逐出京都，被派往商州去当刺史。后来，太宗动了恻隐之心，授萧瑀金紫光禄大夫，复封宋国公，加特进。贞观二十二年（648年），萧瑀病逝，终年74岁，追赠司空、荊州都督，陪葬昭陵，赐谥号“贞褊”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终其一生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，萧瑀依然初心不改，历久弥坚。贞观二十二年（648年），当萧瑀预感到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，“临终遗书曰：‘生而必死，理之常分。气绝后可著单服一通，以充小敛。棺内施单席而已，冀其速朽，不得别加一物。无假卜日，惟在速办。自古贤哲，非无等例，尔宜勉之。’”诸子遵其遗志，敛葬俭薄。”

骨鲠亮直冰堂心，感天动地泣鬼神。隋炀斗筲逐忠直，唐祖慧眼迎净臣。武德力谏立英主，贞观之治彰殊勋。二十年间六罢相，两朝隆兴慰忠魂。



神头岭上“镇神头”

□ 崔 庆

唐宣宗大中年间，日本王子访问中国，自恃擅长围棋，要求挑战中国棋手。赛前日本使团不惜重金，广泛收集大唐翰林院的棋谱，反复研读，以求一胜。大国浑厚，变化万千，国手顾师言沉着应战，棋至33手，以一招“镇神头”让日本王子自动认输。

这场较量未见于正史，但博弈之理古今一也。“镇神头”的精髓在于，“以我为主，不要旁顾，宁失一子，不失一先”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1000多年后，抗日战争中，中国军民奋勇反击，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，神头岭伏击战似乎复制了顾师言的对局，神头岭上“镇神头”，气贯长虹，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和精神。

地图之误

1938年初，日军猖狂一时，由邯郸进犯晋西南，直接威胁陕甘宁边区。八路军针锋相对，在邯郸至长治公路一线牵制日军，寻机歼敌。129师按照重点打击的思路，拟以385旅一部进攻黎城，引诱路城日军来援；以386旅在路城和浊漳河之间设下“口袋”，伏击增援黎城的日军。

作为此战主力，386旅在战前讨论会上很快选定神头岭作为战场。地图上的神头岭是绝佳的伏击

地点，两山夹一沟，部长公路从沟底通过，只要占据两侧山头，居高临下，可谓胜券在握。386旅没有“纸上谈兵”，迅速赶赴实地勘察，但大家都大吃一惊，神头岭实际地形和地图严重不符。标注在沟底的公路实际是在山梁之上，山梁宽度只有100多米，道路两旁有一些国民党部队遗留的简易工事，只剩残垣断壁。伏击战先失地利，这一战还打不打？

来之则战

得知地形不利后，386旅还侦察到潞城日军救援黎城的兵力高于预计，可能超过1500人。学习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战争，纸上得来终觉险！如果在神头岭按原计划组织伏击，困难重重：一是主力部队隐蔽困难，二是冲锋阶段部队难以展开，三是预备队无法快速运动到位。在此之前，129师在晋东南组织过多次战斗，都是依靠地形优势获胜。地形比设想得不利，敌人比预计得多，神头岭之战成了一块“硬骨头”，要吃得下，消化得了，无疑是一次巨大挑战。

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386旅旅长陈赓和政委王新亭决定还是要打这一战。险中求胜，最危险的地方，往往也是最为安全的。神头岭的地形不适合伏击战，日军会思想

麻痹，放松警惕，反倒有机可乘。山梁之上，空间狭窄，不利于兵力展开，只能近身相搏，我难敌也难，成了公平的制约因素，先下手为强。

事成于细

决心要打之后，所要做的就是精心准备了，要有亮剑之勇，也要有亮剑之能。386旅将772团主力布置在神头村西侧，771团主力布置在张庄、王家庄以东公路两侧，正面阻击敌人，发动第一波进攻；772团2营和771团1营作为预备队，隐蔽在神头岭对面的高地申家山，伺机发动第二波进攻；此外，772团一部对于潞城日军的后方进行袭扰，771团一部对黎城方向保持警戒，386旅抖擞精神，拉开了“吃大餐”的架势，等待万弧挺刃的时刻。

在神头岭主战场，参战部队的战前准备更是细之又细。772团就埋伏在公路旁数十米处，利用国民党部队遗留的旧工事隐蔽。这些工事虽然残破，但却是最好的“道具”，772团刻意不动旧工事上的浮土，踩倒的草顺着风向扶起来，一切伪装得平静如水。

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。1938年3月16日上午9时许，神头岭伏击战打响，一切按照计划进